

天橋

熊元一 著

S. I. HSIUNG

THE BRIDGE OF HEAVEN

天橋

熊式一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桥/熊式一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35-2332-5

I. ①天… II. ①熊… III. ①讽刺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8244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策划编辑: 吴 浩 邓晓菁

责任编辑: 赵雅茹

执行编辑: 方宇荣

装帧设计: 赵 欣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2332-5

定 价: 39.0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23320001

读《天桥》有感*

(英) 约翰·梅斯菲尔德
屠岸 译

李大同，还是个男孩，
他满心是安恬，愉快，
只想在绿草庭院内
种植李树或白玫瑰，

这就能在春天，六月，
让天上的明灯——满月
在洁白透明的时光
替“人”把白花照亮，

这样，寻访者就会
低语：“她会不会说起
这奇事？她会不会许愿
要消除我们的苦难？
她能不能从绿叶枝头
下降，做我们的王后——
我们的救星？噤声！
瞧她下来了……她能。”

* 本诗为英国桂冠诗人梅斯
菲尔德 (John Masefield)
为本书所写代序诗。

他长大以后，在宽广
寥阔的中国土地上，
找不到任何僻壤——
可用来种树的地方。
相反，有钢铁的志愿
要学会砍伐、斩断
那乱成一团的野草——
它阻挡我们的需要。

今天，“人”的青春，
四月，没五月紧跟，
五月，后面没六月，
夜里，缺失了明月。
受挫生命中有希冀
在未灭的美质中奋起，
以闪烁的光芒突破
种种谬误的黑洞。
那千百万支光焰
把一切耻辱烧成烟！
李大同准定能觅得
他心灵安宁的寓所；
盛开的李树将绽放
白花像雪花般飘扬，
上面有宁静的月亮
在静海一般的天上。

1942年10月15日作
2012年5月30日译

On reading The Bridge of Heaven

To Ta Tung, as a boy,
This hope gave gentle joy,
To plant, in some green close,
A plum-tree or white rose,

That, so, in Spring or June
The lamp of the full Moon
Might show to Man the flower
White, in its whitest hour,

二

That, those who came to seek,
Would whisper: "Will she speak
This Wonder? Will she bless
Our woes to nothingness?
Will she descend the green
Sweet sprays, and be our Queen?
Our Saviour Queen? O, still...
She moves... She will."

Then, growing-up, be found
No garden-close, no ground,
In all wide China's space
To be a planting-place.
Instead, an iron will
To learn to kill, and kill,
The tangle of the weeds
That thwart men's needs.

Thus is Man's youth today,
An April without May,
A May without a June,
Night without Moon.
But Hope from thwarted lives
In unquenched beauty strives
Slowly its glimmer breaks
The darkness of mistakes.
So many million flames
Will burn away the shames;
Ta Tung will surely find
His plot of Peace of Mind;
His blossomed plum will lift
White as the snow in drift,
Under a Moon of Peace
In skies like the still seas.

John Masefield
October 15th, 1942

大陆版序

关于熊式一《天桥》的断想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林语堂（1895—1976），二是蒋彝（1903—1977），三就是本书的作者熊式一（1902—1991）。

这三位同时代人，不仅在中文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更在生前就用自己的英文创作走向了世界。林语堂以散文集《吾国吾民》、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等风靡欧美，蒋彝以图文并茂的散文集《湖区画记》、《牛津画记》等“哑行者”系列游记享誉欧美，而熊式一则以话剧《王宝川》^①和长篇小说《天桥》等赢得广大欧美读者的喜爱。

然而，与林语堂的中英文著作早已大量出版、与蒋彝的“哑行者”系列等正陆续刊行相比，熊式一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就严重滞后了^②。

严格地讲，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已在《小说日报》、《新月》等大牌新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译作^③，并且还得到过郑振铎、徐志摩等新文学大家的肯定，熊式一在远赴英伦之前，毕竟在中国只是小有文

① 该剧由中国传统京剧《红鬃烈马》中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事改写翻译而来，英文名为 *Lady Precious Stream*。

② 迄今内地出版的熊式一著作仅有二种：《王宝川》（中英对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散文集《八十回忆》（陈子善编选），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年。

③ 自1930年10月第21卷第10号发表英国巴蕾的《半个钟头》和《七位女客》两个剧本起，《小说月报》陆续刊登了不少熊式一的译作；熊式一还在1931年《新月》第3卷第11、12期连载萧伯纳的《“人与超人”的梦境》译作。

名。直到1932年底远涉重洋到英国深造，他的文学生涯才展现了真正的多彩多姿。

熊式一的英文处女作——话剧《王宝川》，1934年夏由英国麦励书局出版，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一炮走红，好评如潮，奠定了他在英美文坛的地位。

同年冬天，熊式一又亲自执导，把《王宝川》搬上英伦舞台，更是雅俗共赏，久演不衰。不久，瑞士、爱尔兰、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相继上演《王宝川》。次年秋，《王宝川》又移师纽约百老汇，美国剧坛也为之轰动。从此以后，熊式一一发而不可收，他翻译了《西厢记》——这部译作特别受到萧伯纳的赏识，还创作了以“我国近代历史为背景”的话剧《大学教授》，等等。熊式一以擅长英文、独树一帜的中国话剧家的身份活跃于欧美剧坛。

三

四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熊式一一直在英国。他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战，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怀念王礼锡》^④等文；另一方面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天桥》，终于夙愿以偿。1943年《天桥》在战火笼罩的伦敦问世。这部长篇小说成为熊式一英文创作的第二个、也是更为引人注目的高峰，是熊式一更具代表性的作品。

《天桥》英文版初版本上有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序诗，熊式一很看重梅斯菲尔德，明确表示他的序诗与作家H. G. 威尔斯的评论和时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的赠诗一起，是“我心目中最引以为荣的”^⑤。这首诗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天桥》中译本中均付阙如，这次在内地简体字版中首次译出与中文读者见面。序诗题为《读〈天桥〉有感》，梅斯菲尔德用浓郁的诗的语言概括小说主人公李大同的成长，其最后几句为：

^④ 熊式一《怀念王礼锡》刊于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文章在深切怀念王礼锡的同时，对他自己的旅英生涯也有生动的回忆。

^⑤ 熊式一：《〈天桥〉中文版序》，《天桥》，香港：高原出版社，1962年。

李大同准定能觅得
他心灵安宁的寓所；
盛开的李树将绽放
白花像雪花般飘扬，
上面有宁静的月亮
在静海一般的天上。

多么恬静美好的图景，梅斯菲尔德赋予了《天桥》更多的诗意。

四

《天桥》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历史小说。它以江西南昌城外李家两代人建筑造福乡民的“天桥”为始终，通过李氏家族的兴衰，特别是主人公李大同非比寻常的从出生到32岁的曲折经历，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大地的巨变。

五

李大同从私塾到洋学堂，到北京，到投身维新，到南下加入兴中会，到最后武昌起义建立民国，熊式一精心塑造的这个文学形象，既有他自己某些经历的投射，更寄托了他对未来中国的理想和追求。李大同的成长过程是晚清一代青年奋斗成长过程的一个缩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桥》是一部成长小说，也无不可。

有意思的是，《天桥》虚实相融。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小说人物揉和，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小说情节嫁接，是《天桥》的一大特色。孙文、李提摩太、袁世凯、容闳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一出现在小说中。李大同置身于他们之间，与他们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使小说的人物因此更具实感，小说的情节因此更加跌宕，《天桥》也就更具浓郁的时代气息。

五

回顾一下中外《天桥》接受史是很有意思的。

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天桥》，敏感地指出：“我觉得熊式一的《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

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从前他写了《王宝川》使全伦敦的人士为之一快，但是这本书却是绝不相同的一种戏剧，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画图，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⑥他强调的是自己的阅读经验，他从《天桥》中读到了一个古老大国的“革命过程”。

史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天桥》竟留下两首七绝一首七律，数量之多，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意外。陈寅恪的诗早已脍炙人口^⑦，不必再详加征引，需加说明的是两点：一、他首次把熊式一与林语堂相提并论，所谓“海外林熊各擅场”，而且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北都旧俗非吾识”，他更“爱听天桥话故乡”。二、陈寅恪当时在伦敦治疗眼疾，听读《天桥》，才有“故国华胥宁有梦，旧时王谢早无家”的感叹。正如熊式一在《天桥》中文本序中所说的，《天桥》述及戊戌政变中陈氏之祖之父都被革职永不录用，因此百感交集也。

史学家余英时在讨论林语堂的海外论述时，也提到了熊式一，并对陈寅恪写熊式一《天桥》的第一首七绝作了解读。余英时认为这首诗“通篇借林语堂来衬托熊式一”^⑧，“字面上几乎句句偏向熊式一”，越是对熊式一恭维，越显出林语堂在海外文名之隆。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自成一说，但熊式一的文名不可忽视，也自不待言。

熊式一亲自执笔译成的《天桥》中文本早在1960年就在香港问世，但迄今出版的各种香港文学史著作大都未提及《天桥》，令人诧异。唯独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学书目》给予《天桥》一席之地，认为熊式一这部小说“无论写人写事都写得活泼风趣，破除成见”，从《天桥》可见熊式一“想写出中国和西方的真貌，而不欲互视对方为稀奇古怪的国家和民族”^⑨。

2003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天桥》中文繁体字增订版，王士仪教授在序中提出熊式一是戏剧名家，他用“戏剧的结构来‘造’他这本《天桥》小说。以喜剧的形式，达成他所说历史的讽刺。这部小说中

⑥ H. G. 威尔斯：《近年回忆录》，转引自熊式一：《〈天桥〉中文版序》。

⑦ 陈寅恪咏《天桥》的两首七绝和一首七律首见于熊式一《〈天桥〉中文版序》，早已收入近年多种版本的陈寅恪诗集。

⑧ 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现代学人与学术》（《余英时文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⑨ 亦然：《熊式一：〈天桥〉》，《香港文学书目》，香港：青文书屋，1995年。

戏剧核心结构是什么呢？引用亚里斯多德的创作方法，熊老是在重塑历史社会环境中，主人翁面对冲突事件的抉择，由抉择中展现一个人的心灵，即品格，也表示思想。这本小说不仅有一连串冲突事件的好结构，而对冲突行为的抉择更能引人入胜”^⑩，这个观点值得注意。

六

《天桥》英文本在1943年出版后，当年就再版四次，1944年又再版四次，1945年再版两次^⑪，真可谓洛阳纸贵了。1969年，《天桥》英文本又由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出版台湾版。

《天桥》中文本由作者亲自译写，1960年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初版，1961年和1962年又出版第二、三版。1967年，《天桥》中文本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台湾初版，2003年又增订再版。

对《天桥》英、中文的版本源流作上述简要介绍，想必并非多余，至少从这么多英、中文版本可见《天桥》在海内外长久不衰的影响力。

七

在《天桥》英文本问世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天桥》中文简体字本终于问世了，《天桥》英文内地版也即将问世，于是写了这篇不像样的断想以为贺，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内地学界对熊式一的研究。

陈子善

^⑩ 王士仪：《简介熊式一先生两事》，《天桥》，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

^⑪ 据1969年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初版《天桥》英文本版权页所示。

台湾版序

为没有经历大革命时代的人而写*

我父亲的小说《天桥》原英文名为*The Bridge of Heaven*，一九四三年由伦敦彼得大卫斯书局出版。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一致好评，立即成了畅销小说，并多次加印。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各国出版，成了一部具有国际声望的小说。

当时海外真正有名望的华人作家只有三位，即旅美的林语堂，旅英的熊式一和蒋彝。蒋彝是画家，他以“哑行者游记”系列闻名，所有他的书都是以他的画为插图，图文并茂，自成一家。而写小说的，只有林语堂和熊式一。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也差不多是和*The Bridge of Heaven*同时问世，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两位作者的风格虽然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也有相同之处，都是描写清末和近代的中国，所以不免有一些读者喜欢将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这正如陈寅恪教授送我父亲的诗中所说：“海外林熊各擅场”。林语堂在美国写了多部关于中国的书，名声很大，而我父亲的戏剧《王宝川》在伦敦连续三年上演了近一千场，在英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天桥》和《京华烟云》都是他们的第一部小说，同样都获得空前的成功。《天桥》出版的当月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在同月再加印，同年就重印了四五次，第二年又重印了四次，最终重印了十次之多，真可谓纸贵洛阳。

中国有句老话：“文人相轻”，但我父亲对林语堂一向很尊重，并

* 选自2003年台湾正中书局版《天桥》。

曾在BBC的一次文艺节目里和另一位英国作家辩论，称赞林语堂的第二部小说《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林语堂对我父亲的《天桥》也有极高的评价，真可谓“文人相敬”！的确他们二位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在海外以小说的方式将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读者。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大多数都是落后、无知、神奇甚至是邪恶的。惟一比较严肃、真实一点的作家是一位传教士的夫人，**Pearl S. Buck**，中文名字为赛珍珠，她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由穷变富。尽管描写得比较真实，作者的态度也是比较同情的，但整个书还是强调了中国农民的落后和愚昧无知，看不到任何希望和积极的东西。看到这样的书竟然得奖，这使我父亲暗下决心要写书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虽然我父亲早就有试笔写小说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等到一九三九年他才开始动笔。当时抗日战争已开始，他满怀爱国热情完成了现代体裁剧《大学教授》，当时也用同样的热情写《天桥》。书已完成大半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加上种种别的原因，使得他不得不暂时停笔。一直等到一九四二年，《天桥》才全部完成。

《天桥》是继《王宝川》之后又一次轰动全英的作品。假如《王宝川》是因其新鲜、神奇、轻松、带有神话般的故事备受大众青睐，《天桥》则以实取胜。它完全是一部现实小说，以中国近代史为背景，从清末一直写到辛亥革命，许多历史人物，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书中，但《天桥》毕竟是一部小说，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但也是为我们没有经历大革命时代的人写的。

正中书局再版《天桥》，值此中华民族文化再次鼎盛于世之时，堪称文学界一大幸事！我为父亲的遗作能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坛增彩添色感到自豪、欣慰！

我有幸和前来北京参加国际书展的正中书局胡芳芳女士见面，洽谈出书事宜，应她约请写序，特此致谢！

香港版序*

一个三十年来在海外以卖英文糊口的人，一朝回到了居民十九都是同胞的香港来，自然不免要想重新提起毛笔，写点中文东西。回想三四十年前，我在国内以卖中文糊口的时候，并无想在英美文艺界争一席地的野心与计划。到了伦敦之后，偶然听了伦敦大学一位朋友，聂可尔教授（Professor Allardyce Nicoll）的劝告，用英文写了《王宝川》一剧，一切事便出人意表。最初是舞台方面的权威人物，都说它的文学意味太高，绝不能得到广大的观众；换句话说，不是生意经。他们劝我，既然写得出如此的英文剧本，何不写写小说，书局一定会欢迎的。后来《王宝川》的剧本由伦敦麦励书局出版，极得佳评，因此人民国立剧院，把它搬上舞台，结果竟大受观众的赞赏，三年不辍。我因得此鼓励，便跃跃欲试，预备写《天桥》这本小说。

当初我还在起腹稿的时候，有一位好朋友，极力劝我为人不可不成“家”。他说你专写剧本，自然算是戏剧家——我因此便写了《大学教授》、《财神》、《孟母三迁》、《西厢记》等剧——若写小说，非但不成“家”，反变为杂牌军队、万应紫金锭、同仁堂的老鼠屎之类的东西了。这么一来，许多年也就过去了。最后一方面是经不住一位出版家朋友的鼓励——也可以说是利诱——一方面到底是我自己想多辟门径，认为许多大著作家都兼长诗歌戏剧小说，我未尝不可尝试尝试写小说的滋味，于是便毅然决然的闭门造《天桥》了。

《天桥》由英文小说而变成中文小说在香港出版，也是由于我这种喜欢走新路的老脾气。从前在国内以写作为生，卖了十几年的

* 选自1960年香港高原出版社版《天桥》。

文——也有文言，也有语体文——到了英国之后，除了写作之外，绝少提起毛笔，专门以英文写作为生，不觉又是二十多年了。现在到了香港，有了机会，自然不知不觉的又做了下车的冯妇。

我最初把自己改编的《王宝川》译为中文话剧出版，随后又依照我所译的《西厢记》英文本，校订为中文本，在香港出版；这两出戏都在香港电台广播了，而且又搬上了舞台，在艺术节时和香港的观众相见了。去年我又编了一出社会讽刺喜剧《梁上佳人》出版，大大的和香港各种风头人物开玩笑；在舞台上，在电视上，在香港广播电台，都受到了香港观众和听众极大的鼓励，后来又由本地电影界的名手，把它改编改写，变成香港最通行的电影形式，搬上了银幕，使我相信我并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通中文的华侨。今年我又把这一本自己的英文小说，写成中文小说。谁都知道在香港卖文，难求一饱。我的《王宝川》、《西厢记》、《梁上佳人》三本书，在香港出版，并没有收到半文版税；但我仍是再接再厉，一本书一本书继续的出版，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努力合作，明白杀死生金蛋的鹅，并不是致富捷径；把文艺一事，扶到轨道上去。

《天桥》在英国出版的时候，蒙文艺各界，一致予以好评。可是我心中最引以为荣幸的，是这三个人的重视：一是当今英国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梅斯菲尔^①（John Masefield）的代序诗，二是大文豪威尔斯（H. G. Wells），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桥》的评论，三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读后的赠诗。梅氏的代序诗不易翻译，威氏的评论如次：

“我觉得熊式一的《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从前他写了《王宝川》使全伦敦的人士为之一快，但是这本书却是绝不相同的一种戏剧，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见威著《近年回忆录》*A Contemporary Memoir*八十四页。）

陈氏的诗，其中有两首绝句，其一：

① 又译梅斯菲尔德。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
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其二：

名列仙班目失明，结因兹土待来生，
把君此卷且归去，何限天涯祖国情。

此外还有一首七律：

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伽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宁有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一二

诗中一用“听”，一用“听读”，不用“阅”或“阅读”，是因为陈氏那时双目已失明。“海外林熊”一语，是指曾作英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氏。“旧时王谢早无家”一语，是因为《天桥》中述及戊戌政变事，陈氏之祖湖南巡抚陈宝箴，陈氏之父吏部主事陈三立，都在政变时遭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无怪他老先生百感交加了。

《天桥》在英国美国出版之后，马上就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兰文等各种文的译本，在各国问世。虽然风行一时，翻译得如何，我却没有如此渊博的语文学问来评判。可是我真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还要由我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来。当时我以为在我把整本书完全翻译了之后，我想我自己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到底还是英文本，抑是中文本，比较差强人意一点。但是今天把这两种本子比较，这才发现文学作品是不能比较的。用某种眼光来看，英文本中不妥之处，在所不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中文本中也有不少的毛病。我真要诚心诚意的请教精通这两种文学的读者，尤其是对于这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有湛深研究的博学家，不吝赐教。

当这篇小说，自元旦起，逐日在《星晚》上刊登时，常常有爱护我的读者，或写信或打电话到报馆中，意在指正我这小说中的错误。虽然其中并不是我的错误，而大半是读者忘了这是清季的背景，许多地方和官衔，甚至于有的普通名词，都和民国初年绝不相同，可是我仍是衷心感激他们，足见他们重视我的著作，这等于他们认为白圭之上，最好是洁白无玷的意思，我觉得这真是第一件我最荣幸的事。

后来又有许多读者，以及朋友，不断的询问我，李大同这个人何以不见于历史？也有人说，李大同是不是康有为，或者是不是谭嗣同；竟有人说，李大同是不是熊式一夫子自道！

我在这儿只能说，康有为是康有为，谭嗣同是谭嗣同，李大同是李大同，熊式一是熊式一。李大同是书中主角；康有为和谭嗣同在书中都一再提到过；熊式一是本书的作者，书中没有提过他，他的名字，只是在书封面上印着。康有为生于前清咸丰戊午八年二月初五日（阳历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死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阴历丁卯年二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生于前清同治乙丑四年二月十三日（阳历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死于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阳历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大同生于前清光绪庚辰年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时，即光绪六年三月十三日（阳历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比康有为小二十二岁，比谭嗣同小十五岁。日子过得真快！当年大同诞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应该由我负完全的责任。不觉得眨一眨眼，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读者关心史实，不断的询问，我现在只好在这儿作一个总答复：我所写的《天桥》，是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社会讽刺小说，并不是正史，也不是想要补充历史中所语而不详，或是遗漏了的事实。历史注重事实；小说全凭幻想。一部历史，略略的离开了事实，便没有了价值；一部小说，缺少了幻想，便不是好小说。不过许多读者，把我的小说当做历史一般去研究，这是重视我的著作，我根本就不应该去争辩。这成了第二件我感觉最荣幸的事。

当初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觉得西洋人不知道也不明了中国近几

十年的趋势、近代的历史，和人民的思想生活近况等等，所以我要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而且小说中尽量放许多历史人物进去，尤其是外国人所知道的人物，如袁世凯、慈禧、光绪，以及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那知道我写完了大半部之后，于无意中发现写得大错特错，全功尽弃，只得另起炉灶，几乎要重头再写。

我从前觉得西洋出版关于中国的东西，不外两种人写的：一种是曾经到过中国一两个星期，甚至四五十年，或终生生长在中国的洋人——商贾、退职官员或教士——统称之为“支那通”，一种是可以英文写点东西的中国人。后者是少而又少，前者则比比皆是。他们共同的目的，无非是把中国说成一个稀奇古怪的国家，把中国人写了成荒谬绝伦的民族，好来骗骗外国读者的钱。所以这种书中，不是有许多杀头、缠足、抽鸦片烟、街头乞丐等的插图，便是大谈特谈这一类的事。近来还有一位老牌的女作家，用了她同行冤家的笔名，写一部英文的自传，除以杀头为开场之外，还说她父亲有六个太太，她自己便是姨太太生的。

我不能否认他们所根据的是事实，他们有照片为证，这位作家有她自己本人为证，但是我在英美讲演时，总是告诉他们现在中国人大多数都不抽大烟，不缠足，不留长辫儿，不蓄妾，不杀头，但是这有甚么用？我在荷兰时，曾亲眼看见一条小街上，坐着一个青田女人，用一块方布盖着脚。过路的人，给她一点钱，她便揭开方布让那人看一看她一双赤着的三寸金莲！我在意大利船上，碰见过一位德国教授，特别在香港买了一支鸦片枪带回国去示人；而且现在鸦片烟灯，仍是香港畅销的旅行纪念品。还有那位女作家，她也到四处去讲演，好让人家鉴赏鉴赏姨太太女儿的丰彩！

所以我决定了要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大家都是完完全全有理性的动物，虽然其中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因此我一定要找两个西洋人，放在里边。我有一部陈恭录教授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教本——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委员，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马寅初、冯友兰、郑振铎、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